

新学科 新视野

李良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新学科新视野

李良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学科 新视野 / 李良美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45 - 611 - 7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5177 号

新学科 新视野

作 者: 李良美

责任编辑: 徐祝浩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6.5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611 - 7/C · 030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的学术情缘

(自序)

我出生于闽西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靠种田维持生活,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底和文化根基。小学毕业后,家境贫困,上不起中学,父亲送我到亲戚经营的卫生茶楼(饭店)当学徒。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党和政府提出“为工农子女开门,为工农大众服务”教育方针,在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制度,使我有机会上了中学。

1953年,高中毕业,高校招考体检,我们学校有三人不合格,我是其中之一。复查通过后,改填志愿进了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在大学,我对学习是比较刻苦、认真、努力的。尤其对理论课程比较喜欢,学得也比较扎实,成绩也还可以。也比较喜欢练笔、写作。那时,我还是《政法青年》的编辑之一。大概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毕业后留校当了编辑。

学术是对知识的探寻,对学科、学说和方法论的钻研,对客观规律的学科化论证以及对知识的传播和新知识的普及、宣传。1958年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以下略称为上海社科院)院刊室、学术情报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理论 research 班(学习)、华东局内部理论刊物编辑部、市委研究室、信息研究所、新学科研究中心、哲学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返聘)等学术单位和研究部门工作,时间长了,接触多了,引起对学术的兴趣,用学术眼光观察问题,与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是一个20来岁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蓦然回首,感慨万千!我做梦都没想到会以“学术”为自己终身职业!后来细想一想,学术工作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大概这就是我的学术缘分、学术人生吧!古代《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学者胜过一个以色列国王,因为一个学者去世了,没人可以替代他,而一个以色列国王去世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合格的人选。”此话不无道理,是对学者的最高评价。我是一个普通职工,能以“学术”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感到高兴、荣耀和自己的社会责任。

锻炼人的熔炉

——1958 年在上海社科院院刊编辑室

1958 年初进上海社科院,不知社科院是啥样子,没有现成的“模式”,一切从头做起。是年 7 月 26 号,刘季平副市长在召开成立上海社科院的座谈会上说:“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大大落后于形势。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要更快地赶上已经达到的高度,必须想办法,把力量集中起来,办一个社会科学院,它有双重意义,是学院,又是科学院。这样可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领导集中了,力量强大了,可以更好地通盘考虑和安排,同时又是打破常规,更好地使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使政法、财经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创造出‘卫星’,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华东政法学院院刊 1958 年 7 月 27 日)

根据上海社科院“是学院,又是科学院”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在院党委统一安排下,有一部分师生去本市工厂,半工半读(教);有一部分师生下农村(嘉定和南通),半耕半读(教);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分期分批下放郊区农村劳动锻炼。为适应分散教学和沟通半工半读(教)、半耕半读(教)以及科研人员下农村劳动锻炼等情况,院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上海社科院院刊编辑委员会,出版院刊:《小高炉》。刊名是由副院长、经济学家姚耐提出和书写的。他说,刊名定为《小高炉》,反映了大炼钢铁的时代气息,我们的《小高炉》是锻炼人的熔炉嘛!《小高炉》的“小”有谦虚的含义,我们办事情谦虚一点好!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小高炉》是全院师生和科研人员锻炼的“大熔炉”!通过《小高炉》可以把我们锻炼、培育成有用之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希望大家积极投稿,一定要把《小高炉》办好!

《小高炉》诞生后得到全院师生员工的欢迎和支持。最可贵的是我们的老书记李培南、申玉洁,老院长雷经天、姚耐和各研究所、系领导奚原、徐峇、徐锦田、唐文章、袁成瑞、杨峰、顾理、周友珊、李光民、朱崇儒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孙怀仁、邹依仁、王惟中、贾宏宇、杨宽、李鸿寿、傅季重、桂世祚、娄尔行、何海晏、顾维熊、陈锡襄、史惠康、唐如尧、李志远、杨惠、唐传泗、胡鑑美、汪熙、马伯煌、李湘、徐正旦、关可贵、席克正等亲自提笔为《小高炉》写稿。有的还写了三四篇。极大地丰富了刊物的内容,提高了刊物质量。现在这些领导同志、老专家、教授,大部分年事已高,有的离开人世多年,但他们那美好的形象,那亲切的教诲,那刚毅、勤劳的品格和严

谨的治学精神以及那高尚的道德情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然科学、热爱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热爱新生事物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令人怀念、令人钦佩,并鼓舞着我们努力工作、学习,不断克服困难,开拓奋进!

《小高炉》内容包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科学研究的方针;总结下工厂、农村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参加生产劳动和劳动学习的心得体会;改进教学、科研、学习方法,提高教学、科研、学习质量的情况介绍等。文章短小精悍,文笔比较活泼,很受师生们的欢迎。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有的存在片面性,甚至错误。但是时间和实践是我们的最好老师。通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年纪较轻,精力比较旺盛。每两星期,奔走上海、嘉定、南通之间。走出去时,将刊物送到在工厂、农村的老师、同学手上;回来时,将师生们撰写的稿件带回编辑部。编辑部在屠听泉、蒋照义等同志精心安排下,写稿、改稿、编稿、设计、摄影、校对、发行,大家分工合作,碰到困难,大家想办法克服,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和忧虑,工作大家一起干!今天回想起来,最值得我高兴的是,在当年,通过《小高炉》的各种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写稿的积极分子。如邵传烈、赵元三、沈铭贤、邓伟志、戴秉然、袁恩桢、黄汉民、高振农、欧力同、徐堃、王之璋、张华金、孙纪成、孙乐英、尤俊意、范学仁、张启明、火存福等。他们平时学习刻苦、认真,思想敏锐、有活力,文笔也比较活泼;他们热情、诚恳,积极支持编辑部工作。我从他们来稿中学到和吸取了养料和新鲜东西。我们从那时起就建立和保持着深厚友谊。如果我的工作学习有一点进步的话,都是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感谢他们,永远记着他们,不会忘记他们!

精心编辑学术内刊

——1959年在上海社科院学术情报室

1959年,调到上海社科院学术情报研究室,该室的任务有二:一是搜集、翻译、整理、研究国内外学术理论情报;二是编辑出版《学术界动态》(内刊),并通过刊物,将学术理论情报及时呈报上级领导部门,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

《学术界动态》与市委宣传部的《思想动向》是“姐妹刊物”。《思想动向》是反映本市知识界的政治思想倾向,而《学术界动态》是反映本市知识界的学术理论动向。两份内刊,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对了解本市理论动向,进一步做好理论工作有重要意义。

如何编写《学术界动态》,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在杨国璋(主任)和屠听

泉(综合组负责人)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摸索,找到一些头绪。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总的情况是好的,能受学术理论界的欢迎。记得当时上海《文汇报》,由于1957年“反右”时,被莫名其妙地与所谓“章罗联盟”挂上了钩,戴上“右派报纸”帽子,报纸上,只有“批判”、“斗争”的口号,没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加上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斗争,加深了社会矛盾。这时,上海市委传达了中央有关精神,指示《文汇报》要开展学术讨论,请知识界写文章,繁荣学术。该报理论部主任郑心永,经过研究、设计,将报纸的第三版辟为“学术版”,邀请学术界知名人士周谷城、卢于道、谭其骧、杨宽、漆琪生等撰稿。一时学术争鸣气氛十分活跃。原来不太写文章的老专家、老学者陈望道、吴斐丹、傅东华和兄弟省市的一些学者周建人、岑仲勉、高亨等也积极主动为学术版撰稿。我因学术研究工作的关系,时常读“学术版”文章,察觉到上海学术界出现这一新情况,即邀请郑心永写了一份材料,我看后作了补充、修改,以“《文汇报》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为题,刊发在《学术界动态》上,并呈报上级有关部门。

过了一段时间,即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特将此文作了批示,作为正式文件向全党下达。中央的批示说:“《文汇报》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委,请各省市(自治)区委转发到所有省市报纸刊物的编辑部。中央屡次指出:“在实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坚持学术上文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现在的倾向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谈得很少了,对文化遗产的学习谈得很少了,在学术和文艺领域中简单粗暴、片面性的现象有所增长,必须坚决克服,并为此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报纸刊物纷纷开辟“学术版”,发表学术争鸣文章。有的省市(自治)还派专人到《文汇报》理论部学习、“取经”,《文汇报》的“右派报纸”的帽子无形中被脱掉了。这也是《学术界动态》所起的一点作用。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即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云霄,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代替了原有的生动活泼的学术争鸣和学术讨论。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版”和知识界的遭遇和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现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既感动万分,又一言难尽。这种心情和滋味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对苏联说“不”

——1964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部理论刊物编辑部

学术研究是与国内外政治理论形势分不开的。1964年我从上海社科院学术

情报研究室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内部理论刊物编辑部。编辑部的任务是组织华东六省一市有关理论工作者撰写有关理论文章,编辑出版《未定文稿》和《学术研究资料》(不定期内部理论刊物)。提供领导决策和理论界研究参考。

那时,我们对苏共和苏联国内政治理论状况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段时期对苏联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有了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现在回忆,说来话长。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世界引起巨大风波。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当成一个重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当然也引起毛泽东主席深深地思索。

是年11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番描述当时国际共运的既形象、生动,又寓意精深的话:“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人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丢掉了。”(转引自李伟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第583页)毛泽东的寥寥数语,通俗、简明、生动地揭示了当时中苏两党分歧的实质:“十月革命还灵不灵?”不过在那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破裂,只是在内部讨论和相互交换一些意见。

到了1963年,苏共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连续发表多达近千篇论战性的社论和文章。他们把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认识全部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教育学等)领域。学术理论界形势十分复杂严峻。

1963年7月6日晨7时,中共代表团乘飞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代表团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据代表团翻译李越然回忆,在午宴上,双方领导人就进行初次交锋。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我们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感情的。”邓小平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厚望、友好的厚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邓小平摇了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党

关系上。”赫鲁晓夫有些急,说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邓小平回答:“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但我们还没有发表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要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这时,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必须停止互相论战。”邓小平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中苏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1日举行。在会谈开始后,苏共领导在会外仍然没有停止对我们的公开攻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对中国不友好情绪。

7月14日苏共发表《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开篇即说:“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运最重要问题的立场。”这样,他们就把在此之前还是双方在内部讨论的问题和分歧全部向全世界公开了。于是,我们不能不对《公开信》所阐述的“最重要问题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看法,从1963年9月6日—1964年7月14日共写了9篇评论文章,全部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1964年7月14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要求紧急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通知当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领导职务的决定。赫鲁晓夫是下台了,但论战并没有结束。他们继续搞赫鲁晓夫的那一套。是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只讲赫鲁晓夫,对苏共领导一句话也不谈,算是对赫鲁晓夫这桩公案做了个小结。

为了解和研究国际上的这场意识形态大论战,1964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内部理论刊物编辑部。这时,我们编辑出版的《未定文稿》和《学术研究资料》,自1964年到1965年,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艺学、国际关系、教育学等学科角度刊发了批驳苏共有关错误观点的文章和资料。阐明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和立场。这对我来说也极大地开拓了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的磨炼。

这场论战在学术理论界影响很大,虽然过去50多年了,现在回忆起来给我们的印象仍然很深。在论战中,双方的理论水平、思想文采、战术谋略和社会经验、群众关系等各方面都作了一番全面的比较和展示。在论战中,我们刊发的“九评”是历史的产物,当然不会句句是真理,这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在“这方面现在我们也

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页)不论怎样,我们的“九评”为当年的论战作出了最为客观、公正、公平的历史评价。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九评”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也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开创新学科研究

——1988年在上海社科院新学科研究所(筹)

1979年4月,我从市委研究室回到上海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搞学术情报综合研究。那时,摆在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与国外学术理论界的联系和交流已经断绝,国外学术理论界情况不明,怎么去开展研究呢?于是,哲学研究室组织外文力量,用了近两年时间,对苏联和美、英、德、法、日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十年在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普查,搞了近两万张学术卡片。研究发现,20世纪60—80年代,世界各国涌现出了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分支学科、横断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论、分形学和现代入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发展经济学、比较哲学、科学哲学以及人类学、现象学派生出的许多分支学科。与此同时,《学术界动态》也陆续刊发了新学科方面的文稿。引起了有关领导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萌发了开拓学科发展领域的新思绪。即提出了新学科的概念及开展研究的初步设想。

所谓新学科,是指相对于传统学科而言的新产生的学科总称。它与传统学科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传统学科的理论原则,又有现代的新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新学科作为学科整体大系统,有它自己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领域,新的较高的逻辑起点和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正在形成的和发展中的学科系统整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研究其内在矛盾运动的内容、特征、结构体系、功能作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

新学科是新生事物,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很有活力的学科。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首先建立新学科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在金哲和陈燮君带领、指导下,1987年,情报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改为新学科研究室。随即我从综合研究室调到新学科研究室。1988年,新学科研究室进一步扩充,成立了上海社科院新学科研究所(筹)。1989年12月,上海市新科学学会成立。1990年9月,上海社科院新学科研究所(筹)改为新学科研究中心,正式划归情报研究所。1992年,上海市新学科研

研究所成立。这一段时期,以上海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新学科研究中心为主体的新学科研究热潮已经掀起。明确新学科研究方向、任务:搜集、整理、研究当代世界新学科发展的最新资料和动向;探索新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开拓新学科宏观理论新领域;宣传、普及新学科知识;重视新学科应用研究;注意新学科发展史料的积累;预测新学科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其次,在高校开设新学科专题讲座宣传和普及新学科知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有关专业(系)开设新学科专题讲座。由情报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安排专业人定期去讲课。第三,设立新学科研究课题项目,列入院、所重点规划,编写出版新学科研究著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新学科研究队伍和不同学科中新学科研究集体,编写出版了一批新学科研究著作如:《当代新学科手册》(1985)、《世界新学科总览》(1986)、《当代新术语》(1988)、《当代新方法》(1990)、《世界新学科总览续编》(1990)、《现代能力导向》(1994)、《新学科辞海》(1994)、《现代能力专辑》(共6本,1995)、《上海社会科学志·新学科篇》(2002)、《新学科·新亮点·新探索》(2006)、《新学科文化肖像》(2007)等。此外,还撰写一批新学科研究论文。有20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全国、华东地区、上海市科研优秀成果奖。这是新学科研究集体努力奋斗的结果。

新学科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科学工作。有时还要配合出版社做编辑、出版工作。记得1990年,为了编一部《新学科辞海》,花了很大力气,组织本市20多个专业的120余位作者,写出初稿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定稿,全书有条目11000多条,计600多万字。当时稿件用300格稿纸誊写,书稿集中起来有12市尺高。我们把书稿捆了12大包,由我和陈金桂、胡建平三人专程送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关源博说:“嗨!要得,这么多稿件!”第二天召开编辑部会议,连夜突击审稿,一星期后,社长关源博说:“书稿基本可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条目的英文表述不太放心,这个问题由出版社来解决。”后来出版社专门请四川联合大学英语系组织10多位老师,对11000条英语条目逐条研究解决。对于书稿中存在的若干具体问题,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我曾于1991年、1992年两次专程去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没有电脑打字设备,经研究只好将书稿送往昆明新华印刷厂打印清样。这样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1993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通知我们到昆明校阅清样,我和胡建平两人立即赶到昆明,和出版社两位编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清样从头到尾认真读校了一遍。当时天气炎热,一个月下来,真正头昏脑涨,筋疲力尽了!书稿校阅、签字后,因资金没有落实,无法付印。后来商定,由四川人民、四川教育两家出版社联合署名,付印

出版。《新学科辞海》从1989年着手计划组织编写,到1994年11月正式出版,整整花了5年时间!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996年哲学所返聘和参加信息所
有关环境问题课题研究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行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生态环境问题开始由小范围、轻污染、轻破坏、轻危害向大范围、重污染、大破坏、大危害的趋势发展,导致人类面临从未有过的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加剧。

1995年,我退休了,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出于尽学术信息研究的本分,一方面,1996年返聘在本院哲学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部工作;另一方面参加信息所组织的有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研究。

在编辑刊物和参加课题研究中,我着实接触和阅读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信息,开阔了视野,并透视了工业发达国家出现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事件、四日市事件、富山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市农药厂毒气泄漏事件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等,深知震惊世界的“十大环境公害事件”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报复”的警钟,人类要应对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有些学者竭力鼓吹“经济无限增长”,这是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他们认为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追求物质财富“无限增长”是至高无上和天经地义的。针对这一理论思路,1972年,米都斯主持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开发表,报告认为人类要避免“灾难性的崩溃”的最好办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很明显这是经济增长“悲观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一个社会经济怎能“零增长”呢?于是1974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第二个研究报告,修改了原有的观点,提出用“有机增长”来代替“零增长”。他们认为,“有机增长”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核心。要求人类社会的经济、技术、生活、环境等各方面要实现“协调增长”,而不能只强调某一个方面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研究了发展问题。198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观点,研究、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如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文化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等。这就是说,经济发展体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同步进行:“综合发展”就是“协调发展”。

在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发展问题过程中,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首次提出“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出:“强调人类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最大的持续利益,又能保护其满足后代人需要与欲望的能力。”同年,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义仍然是最权威的。

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共识,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能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包括子孙后代的需要、国际主权、国家公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基础、生态抗压力、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等重要问题。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发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充分确认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它是全人类共同选择的伟大旗帜,指引着现代人类走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2002年8月28日至9月4日,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全面审议了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各国政府和准政府组织、企业,宣布了220多项可持续发展“伙伴计划”,其中包括健康、生物多样性、农业、水、能源等5大主题。会议通过了“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政治宣言。宣言号召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积极行动,“拯救我们的星球,促进人类发展,呈现共同的繁荣与和平”,达到有时间限度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目标。

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均使用“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4年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阐明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对策,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普遍改用“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

“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所谓联系,是指两者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这就是指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权威性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两者的外延和范围是基本相同的。所谓区别,是指对“持续发展”说的是一种发展的状态和发展的目标。但它并没有指明可不可以持续、能不能达到持续的目标这个确定性的含义。而“可持续发展”是反映了人们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从“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即这个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其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在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有的学者把“可持续发展”等同于“可持续经济发展”,这是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比“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范围更宽、更广泛。它包括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经济发展”则仅仅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可以理解为“生态、经济、社会”巨大的三维复杂系统运行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系统”则是“可持续发展”组成部分中的一个子系统,两者不能等同、替代。但也不能否认“可持续经济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具有整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本特征,也受整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制约。这是值得注意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认识的再深化。

“可持续发展”是全方位的科学发展,它既包括“横向”的发展,也包括“纵向”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生态环境的发展;既包括当代人的发展,也包括不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发展是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不以眼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是不以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是不以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发展的基础。它既包括数量的增长,更在于质量的提高。只有依靠科学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保证不损害生态环境,才是高质量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的重大革命,是人类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这种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而且还要求体现在作为发展的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这就是说,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资源利用和单纯的环境保护的范围,即要求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科技、文化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导人类走向 21 世纪的全面性的发展理念。当然,不同方面也可以有不同重点地展开。这样,就要求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须遵从公平性、公正性、持续性和共同性原则。

所谓公平性原则,是指应该追求两个方面的公平。一是当代人的公平。即满

足当代整代人的需求,不是只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二是满足代际间的公平,及其资源分配和利用的公平。即本代人不能只顾自己一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而要给下一代人公平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权利。

所谓公正性原则,是指应注意三个方面的公正性。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性。即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要反对极端功利主义。前者是夸大人对自然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后者是不考虑自然资源的价值和环境成本,以竭泽而渔方式,满足人类短期需求,忽视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因此,要提倡人与自然协调、公正发展。二是与他人之间的公正性。即既要打破资源环境问题上的个人主义倾向,又要反对自由主义倾向。要积极提倡整体性和全局性思想。否则无限制地滥用自然资源,势必造成“公地悲剧”的现象,导致人类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加剧。三是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性。即既要消除只顾当代人的发展,而不顾后代人发展的缺陷,又要消除只讲未来发展,而不及时解决当前重要问题的缺陷。提倡中国社会要世世代代永续发展下去的战略思想。

所谓持续性原则,是指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要注意有所“限制”。即“发展”与“需求”,都要以自然资源的生存为物质基础和以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限度。如果离开这个“基础”和“限度”,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所谓共同性原则,是指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法,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其总目标,即采取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应该是共同的。即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一致的。

探究人生的真谛

——2007 年休闲、学习、人生断想

人生是部天书,永远只有谜面,而难觅谜底。其实,只要你去努力、抗争,“谜底”还是可以寻觅到的。不过,各个人对人生的认识和他的结果不同罢了。

人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一首朦胧的长诗。它时而风趣幽默,时而激励动人,时而催人泪下,时而令人振奋。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久远年代鲜花的芳香,又可以为我们篆刻现世苍凉背后的欢乐;它可以挥洒着某种哲理的深刻含义,又可以为你证明几千年以来关于人类的爱的永恒真理!

现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实在太丰富、太美丽了。这常常会使我们陶醉于其中。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得好:“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一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人生艺术的一部分。回

首人生,百味人生。近年来,休闲、读书,勾起了对人生的种种断想:

人生和生命,不能分开。人,如果没有生命附着的躯体,则是一具僵尸。人和生命都是属于地球的,是地球永恒的美丽和骄傲。生命有生理生命、心理生命和精神生命。三者是一个整体。生理生命是人的基本生命,如果生理生命发生中断,生命就会停止。心理生命是人的各种复杂心理行为的体现,如果心理行为出现扭曲,人就会出现各种难以控制的错综复杂的不正常现象。精神生命是指哲理生命,是人的生理生命、心理生命的升华,是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形态,具有思想、语言、智慧的高级生命形态,一个人如果只是生理生命强健,四肢发达,而扭曲了心理生命和精神生命,就会成为只有生命,而没有灵魂的人。人,最宝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名誉、地位,而是自己能意识到生命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终结。人,活着,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目的、生存方式、生存价值,才是人的最大满足和快乐。

人生与生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先有生命,后有生活。生活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基础性生活。生活是人演绎自己人生的大舞台。生活是一首诗,永远闪耀着人的智慧和哲理。它包含了永不消逝的温情与魅力的伟大,又充满了人类灵魂永恒的秘密。现在生活可以说简单就是好。但简单不是单调。简单是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的,就对了;错的,就错了;爱的,就爱了;恨的,就恨了;笑的,就笑了;哭的,就哭了。生活的价值在于自身健康、快乐和对生活的抗争;在于对生活的知足和创新;在于学会经营自己。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活前景广阔。

品性包括人的品行、品德、性格。其中品德是品性的核心。品性修养好的人,能受人们的尊重、喜爱、信任和支持。人的品性是做人的根本,与人追求的人生价值一样庄严、神圣,它比名誉、地位、财富更伟大、更重要、更美丽和更光辉。品性还包括人的思想修养、谦逊、大度、勤奋以及革命乐观主义。人的品性是人性的光辉闪烁。

信念是指可以确信的并作为行动指南的主张和看法,信念是一个人生存势态的选择,也是对生存质量的向往和追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念,没有信念的人,找不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坐标。信念是人生命的脊梁、生命的希望,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有了这种希望和火焰的力量,即使身处逆境,也能鼓起你生活的力量。

命运是指人的一生中包括生死、贫富、生活逆境状态、趋向的自主选择。人的命运是后天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有一句谚语:人撒下实践的种子,收获了思想;撒下了思想的种子,收获了文字;撒下了文字的种子,收获了行为;撒下了行为的种子,收获了习惯;撒下了习惯的种子,收获了人格;撒下了人格的种子,便收获

了命运。

这塑造命运的模式,其实是创造生命的过程,时时留意洒在意识花园中创意的种子,将会萌生未来人生的经验。人是万物之灵在物质世界中汲取人生经验,以收获精彩的人生。人生有命,自己做主。算命不可信,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由别人来摆布?!

心由境造,境由心生。心冷了,太阳都不再温暖;心热了,冰雪也会融化。心境是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状态的总称。它对人的行为影响起重要作用。一个人在尘世间过久了,难免染上灰尘。“有形的垃圾”,容易清除。而“无形的垃圾”,如烦恼、私欲、苦痛等却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所以,要经常打开心灵的窗户,清理心灵中的“垃圾”,保持“心清意静”的心理状态,才能真正做到自处超然、处人坦荡,无事悠然,有事决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获得身心健康和事业的成功。

“积财万千,莫过读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古人读书很讲究意境。“读《易》松间,读《经》竹下。”夜间读书还有焚香沐浴之习。现代人读书,因立身于节奏快的社会中,他们读书在候车室、公共汽车上、在街头巷尾、路灯下,并读得津津有味。这是现代人读书之氛围。读书为了求知,求知为了明辨是非,使你头脑清醒,清白做人。读书又是美好的精神享受,也是民族自强发展的标志。当你畅游于书海,展书而读时,你会感到走进人类历史智慧的家园,感到生活多了一份靓丽,身心获得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宁静、希望与力量。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餐;授人以渔,可享一生。”这说明读书获得知识的重要意义。读书为荣,读书为乐,读书创造人生辉煌,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山,可以不靠山,人,必须依靠人。人缘就是依靠人的靠山。人缘资源是人缘“金矿”,是成就事业的第一生产力。开发人缘资源,就是要赢得父母、兄弟、姐妹对你的工作的支持;要善于向“对手”学习,要“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老朋友是一杯陈年佳酿,永远散发着温馨的清香”;“新朋友是一杯清新的香槟酒,会给你带来全新的感受”。有了新朋友、老朋友,我们的事业就有了成功的把握。

一个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钱。没有钱万万不能,有了钱也并非万能。钱,本来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媒介物,是劳动产品相互交换的中介。钱,可以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兴办教育、科技、增强国力等;但钱,也可以用来赌博、造假走私、制毒贩毒、贿赂权贵、贩卖人口、卖淫嫖娼、雇用杀手等危害社会的活动。但这并非是钱的过错,钱何罪之有,钱本身并无善恶,而关键在于人本身及其与人生态度、文化、思想、道德品质素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诚信等因素的影响。得陇望蜀,人对钱的欲望是没有满足的时候的,尤其是在当前